

編序

從 2002 年開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共同並輪流主辦「台灣-香港社會意向研討會」。截至目前為止，已出版了七本論文選集，包括：《香港社會政治的延續與變遷》（2004）、《社會發展的趨勢與挑戰：香港與台灣的經驗》（2006）、《新世紀臺港社會風貌》（2008）、《解讀臺港社會意向》（2011）、《面對挑戰：台灣與香港之比較》（2013）、《一衣帶水：台港社會議題縱橫》（2014），和《台灣與香港的青年與社會變貌》（2016）。

第八屆研討會於 2017 年 11 月 4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順利舉行。本書《香港與台灣的社會政治新動向》是該次研討會提交的論文經修改並審查後的選集，也是此一系列的第八本書。

顧名思義，社會意向就是民眾對時下社會政治現象和議題的判斷與傾向；本質上這些判斷與傾向必須透過經驗資料來鋪陳和解讀。既然是在台灣和香港同步進行的社會議題調查，除了對台港兩地社會的民眾意索（ethos）分別剖析之外，也應將台港的焦點議題進行比較，這樣做符合調查計劃的初衷和企圖。之前的七本選集專書，其論文多數是對台港社會意索分別探討，就一特定議題將台港兩地一併比較分析只是少數。因此，將兩地作比較的工夫往往由讀者承擔，但這樣做的話也只能作大體上的參照，而不易對特定議題或現象進行深入比較，要做稱職的比較研究畢竟是比較費心思的，尤其是要在對照的統計數據之後找合宜、妥當的脈絡因素，以取得解讀的思路和靈感，就

更是不易，這需要分析者對台港社會政治變遷的長期趨勢和短期動態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唯有如此，才能在對照數據之餘，找到數據異同背後的社會學意涵。

基於此，本書將收錄的八篇論文分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的香港篇和第二部分的台灣篇之後，特意開闢了第三部分的比較篇。雖然比較篇只有三篇文章，但數量上比早期專書所分別收錄的比較分析文章要多些了。

香港篇的三章，分別探討三個新的社會政治動向，即本土意識（主義）的新集體歸屬感、社會撕裂和矛盾的惡化，和自中國內地移入香港的移民在過去 30 多年來所呈現的某種特殊社會流動問題。台灣篇的兩章，則分別剖析兩個日漸冒起的新政治和社會趨勢，一是民粹政治的竄起，二是對核能發電何去何從的社會民意爭議。至於比較篇的三章，是在台港社會的長期趨勢中，企圖掌握兩地近年出現的新傾向，一是婚姻的去制度化，二是社會信任基礎的鬆動，三是青年社會流動的不同遭遇和感受。我們希望這三章和前七本書所收錄的台港比較論文，能構成台港比較社會學研究的基礎。以下分別對三部分各章的重要論述作簡述，以饗讀者。

第一部分香港篇收錄三篇論文。第 1 章為〈何謂香港本土主義？歸屬感的分析視角〉，作者黃子為、鄭宏泰和尹寶珊界定本土主義為對地方的情感依附，基本推論是假若年輕人較重視本土文化和利益，他們理應對香港有較強的歸屬感，因而有較弱的中國人身份認同、較不支持兩地融合和建制派政團，以及較積極支持民間社會運動。根據作者的分析，在短短十年間，香港已出現了兩代的本土主義：第一代反對偏重發展，提出地方居民和政府共同建設地方社區、保護本地文化；第二代的基調是「反中國」，並成為近年青年社會運動的主流思想。作者運用 2016 年的民調數據，發現香港人的本土歸屬感不低，不過，年輕人的本土歸屬感不比中年人和年長者強烈，本土歸屬感和對社會運動的支持度也沒有顯著關聯，而且歸屬感較強者不一

定較反對香港與內地融合，和不一定不支持建制派政團，這些人反而傾向抱持較弱的香港人身份認同和較高的政治滿意度。這些研究結果比較貼近第一代本土派的看法，與第二代本土派的觀點相距甚遠。質言之，作者的研究結果不支持「年輕世代多在香港出生及成長，對香港擁有強烈的歸屬感，因而較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和認同『反共抗中』的論述」。

第 2 章為〈香港社會撕裂：民意數據描繪的圖像〉，作者鄭宏泰、尹寶珊和黃子為認為香港人對民主運動看法的差異較能反映社會撕裂的狀況，所以運用 2016 年的民調數據，將香港人分為支持與不支持者兩大類，比較他們對個人與家庭狀況、社會與政治信任、歸屬感、認同感、社會問題感、對未來的預期，以及對香港與內地關係的觀感。分析結果顯示，支持和不支持民主運動者的對立，聚焦於對中國政府的政治取態，例如，他們的社會信任度基本相若，但對向中央政府負責的行政長官的信任度，則有高低之別；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並無二致，但對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則有明顯的差異；他們對香港經濟、社會及政治前景的信心相近，但對民主制度的支持度則強弱互見。更涇渭分明的，是他們對香港與內地關係的效應評估和政策取向：支持民主運動者對兩地關係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效應評估，不但較不支持者負面，對於兩地關係何去何從，亦較不支持者抗拒加強融合。因此，作者認為當前香港社會的撕裂，既有衝着中國或中央政府而來的勢頭，又有拒絕求同存異的跡象，彼此的衝突難免愈趨激烈。

在第 3 章〈內地移民在香港：二十年來的社會流動〉中，作者方偉晶和郭樺利用 1981 至 2016 年的香港人口普查數據，對比本地出生人士與內地來港移民的收入差別，發現在 1997 年以後，近期移民（即居港少於七年者）、較早移民（即居港滿七年者）與本地人的收入差距，均有所減少。作者使用 Blinder-Oaxaca 分解分析法，發現個人稟賦（包括學歷、年齡和性別）在解釋內地移民與本地人的收入差距時所起的作用愈來愈大，

而在 1997 年之後，個人稟賦回報所起的作用則在減少。作者認為，這現象表明內地移民受惠於 1997 年之後的社會環境變遷，尤其是去殖民化過程，以及香港與內地加強社經聯繫，令內地移民在勞動力市場上受到較少的懲罰，學歷此項個人稟賦在收入中的重要性得以增加。換言之，後殖民地身分認同或身分政治，是適用於理解內地移民在香港回歸中國後的經濟融入動態。

第二部分台灣篇收錄兩篇論文。在第 4 章〈韓流與柯粉：台灣民粹政治的社會起源〉中，作者林文正和林宗弘指出，全球經濟環境快速變化，世界各地出現相似的民粹政治風潮，台灣也不例外，韓國瑜和柯文哲兩位民粹政治人物於 2018 年選舉中崛起，便是一例。民粹領袖帶動的政治競爭，能凸顯社會階級間的新競合關係；而民粹領袖與階級結盟的形態，也可能產生不同的民粹類型。作者運用 2018 年 6 月和 12 月的民調數據，分析韓國瑜和柯文哲的選民組成與變化，發現族群和身分認同仍是穩定的社會心理因素，足以構成解釋民眾支持特定對象的基礎。作者亦估計了階級對「政黨傾向」（泛綠與泛藍），以及「是否支持柯文哲 2020 年參選總統」的邊際效果，結果顯示，相對而言，這半年間激增的泛藍支持者，主要是失業者、非技術工人和自營作業者，這與歐美國家民粹主義的群眾基礎相若；而柯文哲支持者的社經特徵，則較類似泛綠民眾，很可能是泛綠陣營中對世代正義或勞動權益政策不滿的人士。由此可見，台灣目前的階級貧富分化和產業轉型困境，相當程度來自全球化和依賴中國等結構性因素，危及中小企業、農民、自營作業者與失業者的生活處境，國民黨透過「兩岸開放發大財」的論述來引爆政治「韓流」；「柯粉」的社經特徵則不太符合民粹主義，反而展露了泛綠陣營的內部社會分歧。

第 5 章題為〈永續發展與核能政治：台灣核四發電廠封存爭議的社會意向〉，作者楊文山和施奕任立基於環境社會學與永續發展理論，利用 2013 年的民調數據，檢視台灣民眾對於第四核電廠（簡稱核四）興建及運轉與否的意向。作者指出，超

過六成受訪者同意核四應該停建且不要運轉，顯示隨着環境意識的興起，反核倡議影響了多數民眾的想法。從社會面看，過往的核能決策缺乏社會對話，致使民眾不信任政府的核能政策。從經濟面看，民眾多不願意為了廢核而承擔更高的經濟代價，顯示社會對於積極推動再生能源，還未達成共識。從生態面看，民眾在核能議題存在高度的風險感受。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經濟面會影響民眾對核能政策的態度，政府需規劃更穩健的能源結構，以應對核能比重降低的潛在衝擊。此外，不同性別、學歷、婚姻狀況、收入、階級、政黨認同人士對核能政策的態度不盡相同，政府應更積極披露資訊和推動溝通，為核能議題及能源政策凝聚社會共識。

第三部分比較篇收錄三篇論文。在西方社會，去制度化對婚姻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鑒於經濟發展和個人主義膨脹被視為去制度化的主因，華人社會的婚姻形態亦隨着經濟快速增長而趨近西方社會，丁國輝在第 6 章〈婚姻去制度化：華人社會的取向〉，運用 2012 至 2013 年間進行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數據，以對離婚、婚前性行為、同性戀的態度為指標，探討中國內地、台灣、香港和新加坡華人對婚姻制度的取向，以及四類價值取向對婚姻去制度化態度的影響。作者首先發現，華人社會普遍不認同婚姻去制度化，其中以中國內地與新加坡尤甚；華人對婚姻制度的重視程度明顯高於美國人。其次，價值取向的影響大致與作者的預期相若，即傳統取向和家本取向會減低認同，公民取向和個人主義取向則會增加支持；主導華人社會婚姻去制度化的動力，與美國亦不盡相同。作者認為，新加坡的情況，以及華人社會與美國社會的顯著差異，說明經濟發展和個人主義不足以解釋對婚姻去制度化的取向，必須兼顧政治體制和文化因素的影響。

在第 7 章〈社會信任的基礎：台灣與香港的比較〉中，作者吳齊殷和張允誠指出，個人觀點和社會結構雖被視為影響社會信任的關鍵因素，但鮮有研究同時探討不同面向的個人和社

會因素與社會信任的關係，因此，他們將個人層次區分為「主觀」及「客觀」面向；社會層次則分為「台灣/香港未來發展」及「政府機構信任」面向，並使用 2016 年的民調數據，探討此等個人及社會因素，如何對台港民眾的一般信任產生影響。結果顯示，在台灣，個人層次的主觀因素與社會信任的相關性，顯著高於其他因素；在香港，個人和社會層面的因素都具有相當程度的解釋力。然而，綜合兩種層次不同面向的模型比較，若遵從精簡且配適的原則，無論是台灣或香港，個人層次的主觀評估與社會信任的關係最為密切，這與過去文獻的結論基本一致。

2014 年，台灣和香港先後爆發由青年主導的大規模社會運動，坊間對此提出了五花八門的分析，在第 8 章〈台港青年的社會流動：客觀狀況與主觀認知〉中，作者蕭新煌、鄭宏泰、尹寶珊和黃子為挑選了「上位論」，兼用客觀和主觀指標，從學業、就業和自置居所三個領域，勾勒台港青年的社會流動現況，及其在過去 20 多年間的變化。就客觀狀況而言，九項官方統計顯示，由 1990 年代後期至 2017 年間，兩地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均大幅提升，職業晉升和回報雖明顯落後，但也沒有呈現惡化之勢，最大問題在於青年自置居所的負擔愈益沉重，這造成他們維持以至提升生活質素和階級地位的一大障礙。在主觀認知方面，根據 2016 年的民調數據，自覺過去五年經歷向下流動，或對向上流動前景缺乏自信的台港青年，均屬少數，這顯示兩地青年對個人流動的主觀感受，與社會流動客觀指標的結果基本一致——並非傾向負面。然而，台港青年對當地青年於過去、目前與未來的向上流動機會，則有迥異的觀感——大都傾向負面。由此可見，台港青年雖未必視社會流動為個人面對的困難，但卻傾向將之界定為整體社會的問題，覺得其他青年多欠缺向上流動的機會。

總括而言，本書各篇論文都運用隨機抽樣民意調查資料，就台灣和香港當前的社會政治動向，提供敏銳的觀察和深入的

分析。由進行民意調查、籌辦研討會，到本書得以問世，我們要感謝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的行政支持和經費資助。對參與歷次社會意向調查和 2017 年研討會的專家學者，我們深表感謝。香港亞太研究所的鍾雪怡、梁月蓮和陳韻晴協助資料分析和文稿校對等工作，也在此對他們謹表謝意。

蕭新煌、楊文山、尹寶珊、鄭宏泰

2020 年 9 月

2 香港社會撕裂：民意數據 描繪的圖像

鄭宏泰 尹寶珊 黃子為

前言

近年來，無論在大小報章、社交媒體，還是茶樓飯館，我們經常會看或聽到提及香港的「社會撕裂」，亦多感到問題嚴重。¹不少人認為，此乃社會戾氣重、爭拗多的根源。由於社會撕裂，加上不同政見者言行日趨激烈，有人甚至笑稱，為避免影響心情，寧可消極處理，如不看新聞，甚至移民他方（香港亞太研究所，2016）。

香港乃移民社會，過往儘管有政局不安、社會躁動之時——如 1925 至 1926 年的大罷工、1966 和 1967 年的暴動，但主流意見總是強調和衷共濟、求同存異，專注於「謀生搵食」，既不熱衷政治，亦不傾向「硬碰硬」對抗。為何近年不

1. 如青年創研庫（2017:43）的調查發現，83.7% 受訪青年覺得社會撕裂嚴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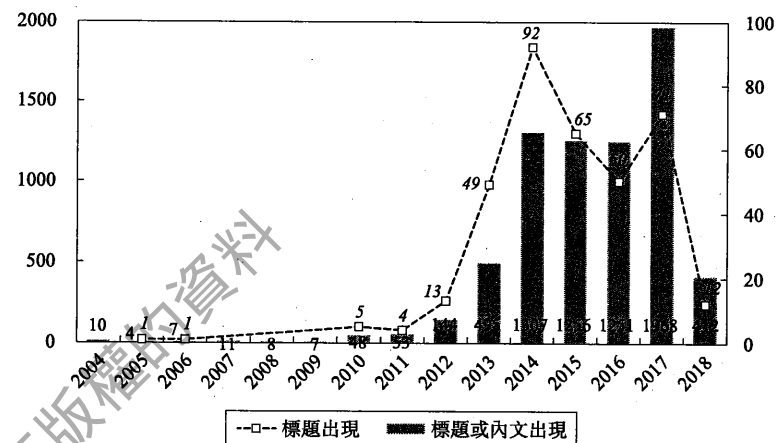
少香港人積極投身社會運動浪潮？在議事論政或爭取政治目標時多堅持己見、「圍爐取暖」，不再願意妥協？對此現象或轉變，市民和輿論雖甚表關注，卻罕有結合實徵民意數據的分析，本文將運用香港亞太研究所進行的全港性民調資料，²嘗試了解原因所在與特質，令社會各方加深對問題的認識。

香港政治變遷與社會撕裂：發展與現況

何謂社會撕裂？從字面看，當然指社會給撕開扯裂了。這名詞過去並不常見。若搜尋慧科新聞（WiseNews）的資料庫，不難發現，此詞近年才出現在台灣和香港的報章上。按「社會撕裂」出現於標題或內文的篇章數目統計，2001年始出現於台灣（《中央日報》，2001）。2003年12月，《天下雜誌》報道了一個民意調查，提及「高達六成的人認為臺灣社會撕裂衝突的情況嚴重」（《中央日報》，2003）；翌年，台灣藍綠兩大陣營角逐總統寶座，競爭激烈，當地大眾傳媒曾有47篇文章提及「社會撕裂」。

2004至2009年間，香港傳媒僅於2005及2006年各有一篇文章標題用上「社會撕裂」；及至2010年，因展開政制改革諮詢，爭議湧現，傳媒亦較多使用此詞，全年有48篇提及「社會撕裂」。隨後，次數緩慢上升，直到2014年，即發生佔領運

圖1：「社會撕裂」一詞出現於香港傳媒的篇章數目



注：僅包括涉及香港的文章。斜體字為於標題出現的篇章數目。
資料來源：慧科新聞資料庫。

動當年，提及此詞的篇章飆升至1,307篇，嗣後數字仍屢創新高，2017年達1,968篇，2018年才驟降至412篇。如以「社會撕裂」出現於標題的篇章數目統計，亦呈現類似趨勢（圖1）。由此可見，「社會撕裂」一詞於2010年在香港始見普及，佔領運動及其後三年居高不下，2013至2017年間，政治爭拗愈趨熾烈、社會矛盾日益嚴峻，或由此而可見一斑。

翻查西方文獻，可發現此詞並沒出現在人文社科的討論，意思相近的應是「社會分裂/裂隙」（social cleavage），此詞較常用於分析政治選舉的投票行為，如Lipset及Rokkan（1967）在《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一文中指出，政黨為贏取議席、爭奪權力，變成了「衝突的代理與整合的工具」（agent of conflict and instrument of integration），因政黨會以不同分野或裂隙，動員支持者，打擊對手，這過程雖會激化衝突，但若處理得當，亦可加強整合。他們還觀察到，西方民主社會大概有四種類別的分裂：邊陲與中心、教會與政

2. 調查於2016年12月1至14日（約晚上6至10時）進行，調查總體是年滿18歲、操粵語或普通話、家中裝有固網電話的香港居民。調查採取兩階段的機率抽樣：（一）以通訊事務管理局公布的固網住宅電話號碼為抽樣框架，隨機選取末四碼，再隨機抽出號碼；（二）成功接觸住戶後，按「即將生日原則」抽取受訪對象。調查成功訪問1,002人，按美國民意研究學會（AAPOR）的合作率公式一（COOP1）計算，合作率為39.5%；若將置信水平（confidence level）設於95%，抽樣誤差為±3.1個百分點。

府、農村與城市，以及工人與雇主。社會存在眾多群體，導致分裂的主因有三，其一是群體各自擁有文化或社經共同特徵；其二是群體擁有集體身分，可一致行動以維護利益；其三是相關的身分可透過集體行動展示出來。換言之，縱使社會出現不同文化或社經特徵的群體，若其集體身分沒受到刺激、催化，因而促使他們採取一致行動以維護利益，則應不會有相關的集體行動，也就不會鬧出分裂的問題。促使群體採取一致行動，自然牽涉社會動員。

Lipset 及 Rokkan 的觀點常被學術界引用和探討，令社會分裂一詞流行起來 (Rae and Taylor, 1970; Harrop and Miller, 1987)，論及的分裂隨之已不限於前述四種，而是遍布不同層面 (Huntington, 1974; Inglehart, 1984)。再者，二人提及社會政治空間擴大，尤其加上選舉期間各種政治動員以爭奪權力，因為挑釁、慫恿等行為，激發潛在矛盾、加深分裂，他們的有關觀察亦不斷獲得證實；政治動員雖或收促進社會整合之效，但亦容易弄巧反拙，演變為社會衝突、裂隙擴大，這種情況屢見不鮮，不得不防。

眾所周知，由於社會乃由無數不同膚色、信仰、理想、價值觀念，以及不同家庭背景、經濟地位、社會階層等個體組織而成，各人觀點有異、目標不一，立場和利益不盡相同，這可算是自然的社會分野。雖則如此，成熟穩定的社會總能在某種力量的牽引下，達成發展共識，讓社會朝着大多數人的取向前進。我們從社會共識，可管窺社會核心價值的輪廓和變化。

撇開學術理論不說，單從香港社會狀況而言，自開埠至回歸之前，一直華洋雜處，又是殖民統治，就算是佔九成多的華人人人口中，亦有來自五湖四海的族群（廣府人、客家人、閩南人、水上人等），與三教九流人士（商人、工匠、苦力、無業者等），雖然如此，統治者卻能推動經濟繁榮至上、穩定壓倒一切的共識，引導市民將注意力用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之上，然後在政治上收緊空間，不讓民眾參與，塑造出普羅百姓對政

治「不聞不問、甚為冷感」的氛圍 (Hughes, 1968)。其中最成功、最常被引述的，當以大家同坐一條船，「不要搖晃小舟的意識」(don't rock the boat mentality) 最為突出。在這種共識或核心價值主導下，香港由小漁村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生活條件大幅改善，社會長期保持安定，但人民雖擁有多方面的自由，政治發展卻乏善足陳。

回歸在即，儘管民眾對政治發展不予厚望，覺得只要社會安定、自由依舊，即可「收貨」，但對經濟前景，則滿抱信心 (Lau, 1999)，覺得可更上層樓，並成為推動中國不斷前進的領先力量。可惜事與願違，回歸初年，香港因亞洲金融風暴打擊，經濟發展節節敗退，股市、樓市疲不能興，令本來賦人自信的領先優勢備受挑戰和衝擊，隨後更因內地經濟騰飛，香港反要依賴其扶助和帶動，才能走出困境，因而忐忑不安。

接着的發展是，香港社會似將遭遇的各種挫敗與困難，歸咎於新政府管治能力不如前朝，應對危機缺乏先見、進退失據，政制不民主、官員不問責、中央政府不信守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等，其中後者更被視為問題癥結。隨着指責升溫，政治氣氛與生態均發生變化，其中以議政、論政和參政者日多較為矚目。本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制度框架下，政治空間較殖民時期開放、有志參與政治者增加，這是可以預期的發展；然而，將加快民主進程視為解決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 (王卓祺, 2015; 陳健民, 2015)，甚至「錯誤理解」特區的行政主導制度設計，以及《基本法》的起草原意和與憲法的關係 (《文匯報》，2015; 張志剛, 2017)，則既不反映社會現實，又引起特區及中央政府的疑慮，尤其因為部分主事者的言行，如主張香港獨立、公開焚燒《基本法》(《明報》，2015, 2017)，更觸動北京確保國家主權的紅線，對港政策愈益強硬，香港內部的政治爭拗——或說社會撕裂——乃日趨熾烈。

若核心價值能表達社會共識，那麼 2004 年由近三百名專業人士聯署的《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就很值得注意，該宣言

指出「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乃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並呼籲港人以言論和行動，共同維護此等價值，讓香港「與全球現代化文明接軌」，以免「變成失去靈魂的軀殼」（《明報》，2004）。此宣言帶出三個要點：其一是聯署者對香港過去賴以成功的看法，與一般民眾的認知或學術分析有出入；其二是他們認為捍衛這些價值的警鐘，已經響起；其三是呼籲全體港人以言論和行動，維護這些價值，顯示他們會採取行動，改變持不同核心價值者的想法。可以預見，社會的矛盾必然激化。

根據我們長期進行民調所得，香港的核心價值既非一成不變，也不限於上述宣言所列，各價值的重要性亦不盡相同，因此，有關香港核心價值的爭拗，乃持續湧現。舉例說，於1970年代末，在社會安定與民主自由平等之間，港人多選擇前者。³ 1980年代初，中英兩國展開香港前途問題談判，香港亦隨着政制改革踏上獨特的民主路。於1980年代末，在繁榮安定與民主政府之間，港人仍多選擇前者。⁴ 於回歸當年，在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個人自由和民主政府之間，絕大部分港人選擇前兩者。⁵ 就算在提出上述宣言的2004年，當被問到在個人自由、

3. 1977年，當被問到「您認為香港政府最重要的責任是保持社會安定，還是建立一個更民主、自由、平等的社會」時，57.3%受訪者認為是保持社會安定，只有10.5%認為是建立一個更民主、自由、平等的社會，30.7%回答兩者同樣重要。
4. 1988年，當被問到「您認為繁榮安定和民主政府哪樣較為重要」時，58.6%受訪者選擇繁榮安定，17.2%選擇民主政府，21.0%認為兩者同等重要。
5. 1997年，當被問到「在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個人自由和民主政府四項價值中哪一樣最重要」時，52.6%受訪者選擇社會穩定，23.3%回答經濟繁榮，10.4%寧取民主政府，7.7%認為是個人自由。

公共秩序、司法公正、社會平等、政治民主和繁榮安定的各種價值中，哪樣最為重要時，亦有54.7%受訪者認為繁榮安定最重要，16.6%及12.1%回答是個人自由及司法公正，而覺得社會平等、公共秩序和政治民主最為重要者，僅各佔8.0%、2.8%及1.5%（張妙清、鄭宏泰、尹寶珊，2017:62-65）。

由此可見，《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公布之時，繁榮安定仍屬多數港人最珍重的價值，與宣言所倡議者明顯存在落差。那怕是就核心價值爭辯五年後的2009年，在維持社會秩序、增加政策影響力、穩定物價和保障言論自由之間，大多數港人還是選擇社會秩序或穩定物價。⁶ 換言之，儘管香港的核心價值或共識會因應實際情況而發生變化，但基本上仍偏重繁榮與安定。

然而，社會矛盾與爭拗畢竟因彼此價值觀念不同而日趨熾烈，後來更走上了「硬碰硬」之路。戴耀廷在2014年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後發展為「雨傘運動」或稱「佔領運動」），提出在爭取普選的重大議題上，應該準備運用像「核彈」般「『殺傷力』更大的武器」——即「佔領中環」，癱瘓香港政經中心（2013a, 2013b），對佔領運動後香港的社會撕裂問題，他有如下觀察與分析：

自雨傘運動爆發之後，香港社會的確是撕裂了，已割裂成兩大板塊。第一個板塊希望盡量維持現狀不變，即使要改變也要慢慢來，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是最重要考慮……這可稱為保守板塊。第二個板塊希望進行社會改革，即使現

6. 2009年，當被問到「最近有很多關於香港未來十年發展目標的討論，大家都有不同看法，就您個人而言，維持社會秩序、令市民對政府重要政策有更大影響力、穩定物價和保障言論自由這四項目標，哪一樣最為重要」時，36.1%受訪者認為是維持社會秩序，30.6%選擇穩定物價，15.8%回答是保障言論自由，10.3%認為是令市民對政府重要政策有更大影響力（張妙清等，2017:65）。

在已有一些改變但太少太慢[即不同意「慢慢來」]，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雖重要，但可持續發展及公平公義是更重要……這可稱為改革板塊。

保守板塊本已存在，也就是大部份港人一直信納的那一套。改革板塊不是始於雨傘運動，在殖管治最後的二十多年已開始形成，在主權回歸前後一步步成形，到雨傘運動終凝聚成一個足夠大的板塊，雖總力量仍可能不及原先已有的保守板塊，但發展至現在，已有足夠力量去挑戰保守板塊的主導地位，這才令香港社會撕裂。(戴耀廷, 2015)

明顯地，戴耀廷一方面確認社會已陷於撕裂，另一方面提出「兩大板塊」(保守與改革)對碰的看法，認為這樣方可形成撕裂局面。同時，他又承認保守板塊所推崇的核心價值，「就是大部份港人一直信納的那一套」(即繁榮穩定)；而改革板塊所推崇的核心價值，則在殖管治最後的20多年開始「形成」，原因自與政治空間逐步開放有關，回歸後，此空間進一步擴大，佔領運動令改革板塊的力量加強凝聚，從而「挑戰保守板塊的主導地位」，所以「令香港社會撕裂」了。

此外，戴耀廷承認，他所指的「保守板塊」，雖然「希望盡量維持現狀不變」，但其實並非抗拒改革，只是強調「即使要改變也要慢慢來」，尤其擔憂過急的改革，會削弱或傷害「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所以，若中肯點說，應只是「緩慢改革」與「急進改革」之別。但很不幸，無論是傳統的大眾傳媒，還是時尚的社交媒體，兩方(或用戴耀廷的話「兩大板塊」)的爭拗，卻變成了好與壞、對與錯、真與假、黑與白的對決，最終「令香港社會撕裂」。

雖然社會撕裂嚴重，更有市民對此感到憂慮，惟社會對價值觀相異者的人口社經特徵、個人與家庭狀況，以及對社會的觀感，如對政治人物和組織的信任、對社會問題的評估、對未來的預期、對香港與內地關係的看法等，仍缺乏了解，坊間縱

表 1：對社會改革運動與民主運動的支持程度 (%)

	社會改革運動	民主運動
非常支持	5.9	6.1
支持	60.4	43.3
不支持	30.0	42.4
非常不支持	3.7	8.2
(n)	(710)	(672)

注：不包括回答不知道及拒答者，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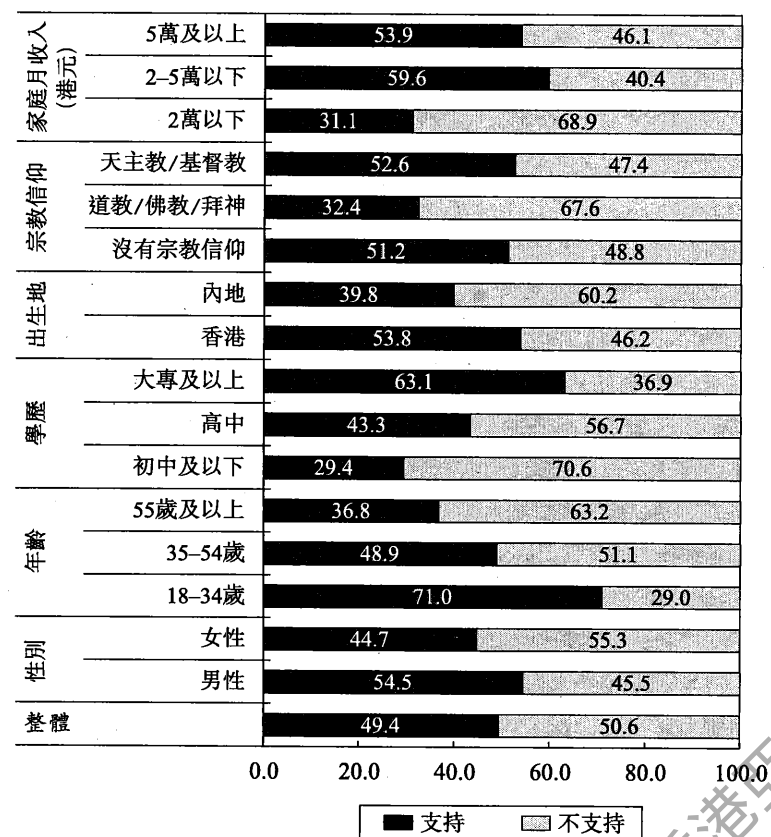
有一些分析，卻缺乏實徵數據支持。下文的討論，主要集中於這些層面，並以2016年底進行的民調資料為根據。

支持和不支持民主運動者的人口社經特徵

戴耀廷雖以「保守板塊」和「改革板塊」形容社會上兩股力量，以及社會撕裂源於兩股力量的碰撞，但一如他本人所承認，這兩股力量對社會變革的看法，其實只屬步伐緩急之別，沒有本質不同，真正令兩者出現重大分歧、爭拗不斷的，是對推進民主、爭奪政治權力上所持的不同態度與立場。民調所得可說明這種差異。

調查中，我們詢問受訪者對社會改革運動與民主運動的支持程度，並得出如下結果。首先，當被問到「您是否支持近兩年來民間社會組織推動的社會改革運動」時，表示支持的受訪者比例佔66.3%，不支持者佔33.7%。其次，當被問到「您是否支持近兩年來民間社會組織推動的民主運動」時，表示支持和不支持者的比例，各佔49.4%和50.6%(表1)。由此可見，對於社會改革運動，多數市民是支持的，但對民主運動，支持與反對者則勢均力敵，這或是導致當前社會撕裂的主因之一。

圖 2：支持和不支持民主運動者的人口社經背景 (%)



注：經卡方檢定，所有社群差異均達 .05 統計顯著水平。

由於市民對民主運動看法的差異較能反映社會撕裂的狀況，我們簡單地將受訪者分為支持與不支持者兩類，先比較其人口社經特徵，再分析他們對個人與家庭狀況、社會與政治信任、歸屬感、認同感、社會問題感、對未來的預期，以及對香港與內地關係的觀感。

圖 2 是支持和不支持民主運動者的人口社經背景。交互表

表 2：民主運動支持度的線性迴歸分析

女性	-0.087
年齡	-0.008**
學歷 (初中及以下)	
高中	.006
大專及以上	.190
內地出生	-0.035
宗教信仰 (沒有宗教信仰)	
道教/佛教/拜神	.001
天主教/基督教	-.030
家庭月收入 (2 萬港元以下)	
2-5 萬港元以下	.127
5 萬港元及以上	.059
常數	2.751
Adjusted R ²	.075
(n)	(537)

* $p < .05$ ** $p < .01$ *** $p < .001$

注：括弧內為各自變項的參照組。

列 (cross-tabulation) 分析結果顯示，支持民主運動的，以男性、香港出生、信奉天主教/基督教或沒有宗教信仰、中等或高收入者的比例，各顯著高於女性、內地出生、信奉道教/佛教/拜神、低收入者；此外，年齡愈輕和學歷愈高者，亦愈支持民主運動。

鑒於各種社經背景因素環環相扣，我們再運用線性迴歸 (linear regression)，分析不同社經背景因素與民主運動支持度 (非常不支持 = 1，不支持 = 2，支持 = 3，非常支持 = 4) 的關係。如表 2 所示，只有年齡達統計顯著水平，呈負相關，換言之，愈年輕者愈支持民主運動。其他社經背景因素不達統計顯著水平，它們與對民主運動的支持度沒有獨立關聯，這點其

結論

無論是民調數據，或是社會評論（如紀碩鳴、劉項，2013；黃偉豪、陳慧華，2015；戴耀廷，2015），均一致認為香港近年社會撕裂嚴重，甚至陷入「只論敵我，不講是非」的局面，此情況2018年時雖略見緩和，但相信撕裂仍會曠日持久。「社會撕裂」有從台灣傳入、且受其影響的跡象，同時又可說是個全球性現象（Chou, 2015；宋恩榮，2017），就算是美國、英國、德國、法國、西班牙和希臘等成熟民主國家，近年亦備受撕裂折騰，不但政治立場不同的傳媒與評論各持己見，以語言暴力互相攻訐，甚至家人、親戚、朋友或同事亦因政治立場而激烈爭拗，社交媒體（例如臉書）更湧現「unfriend」的所謂「絕交潮」。在這方面，香港沒有例外。

回到前文談及的Lipset及Rokkan（1967）理論，他們提出的兩大觀點，無疑甚具參考價值，在某程度上亦反映了當前香港社會的撕裂問題：其一，政治空間開放引來權力競逐，這情況在選舉時期尤為明顯；其二，社會本身總有不同裂隙，各方政治力量的權力競逐，雖說有助社會整合，但有時亦會引起更大撕裂，不利社會和諧，更會威脅社會穩定。

有關政治空間擴大一項，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施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與殖民地時期相比，政治空間的擴大實在毋庸置疑，但此問題並非本文主旨，在此略過不表。若只集中關注不同政治力量角逐權力故而導致社會撕裂，則必須先觀察香港社會已經存在的各種裂隙。Lipset及Rokkan（1967）認為，社會分裂主要根源於邊陲與中心、教會與政府、農村與城市，以及工人與雇主四個方面。其他學者則作出補充，提出了更多不同類別的社會分裂。說實在，複雜的社會所呈現的裂痕和裂隙，確是多不勝數，包括基於性別、年齡、世代、種族、種姓、階級、職業，以至宗教、價值取向和意識形態的分野，不一而足。

可是，若細看當前香港社會最為嚴重的撕裂，應不屬於

上述的類別，此點亦反映了香港民主進程的特殊性（劉兆佳，2014，2017）。根據我們的民調結果和分析，可清楚看到支持和不支持民主運動的兩組市民，對香港與內地關係的效應評價和政策取向，均呈南轅北轍之勢。而志在民族復興的社會主義中國，與奉民主選舉為主臬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一直難以停止較勁，支持和不支持民主運動，則成為這兩股勢力的動員基礎。

於是，但凡涉及政治、意識形態，尤其是與中國政府相關者——包括本文分析的「中國效應」，兩組市民的看法可說涇渭分明，例如，他們的社會信任度基本相若，但對向中央政府負責的行政長官的信任度，則有高低之別；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並無二致，但對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則有明顯的差異；他們對香港經濟、社會及政治前景的信心相對接近，但對民主制度的支持度則強弱互見。更牽動神經的，是他們對香港與內地關係的效應評估和政策取向：支持民主運動者對兩地關係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效應評估，不但較不支持者負面，對於兩地關係何去何從，更較不支持者抗拒加強融合。

進一步說，當前香港的社會撕裂問題，既有衝着中國或中央政府而來的勢頭，又有拒絕求同存異、拒絕政治妥協的跡象，撕裂因而愈趨激烈。對中央政府的抗拒反映在本土主義抬頭，甚至冒出「香港獨立」的訴求，兩者由淡到濃皆染上了「分裂」色彩。對政治妥協的抗拒可從圖1中清楚地看到，「社會撕裂」一詞在大眾傳媒出現的次數，數年間的升幅以百倍計。由此帶出兩個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一、若社會撕裂是衝着中國而來、要與中央政府對着幹，那麼，香港社會無疑會掉進一個極為不利，甚至十分危險的境地。因為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是由中央政府構思、作出承諾，並由其授權的；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結束殖民統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完成的；當前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已擺脫過去的貧弱，走向民族復興，國勢強盛。與之對着幹，既極為不利，又十分危險。

二、民主不但強調一人一票，更重視共識政治，尋求建立大多數市民共同信守的核心價值，社會穩定、和諧更是民主得以健康成長的沃土，社會撕裂則不利民主的孕育和成長。從這個角度看，若是真心誠意地推動民主、落實民主，實不宜採取鬥爭或革命性的手段，所以在表達政治信念或是追求政治目標時，應避免暴力，包括語言暴力，因為暴力很容易陷入惡性循環，最後自然是社會撕裂。這樣做的結果，很可能落到「贏了場架、輸了個家」的局面，得不償失。2019年爆發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便落得個折戟沉沙的下場。

要怎樣才能令社會重現和諧、減少撕裂呢？戴耀廷曾提出如下的回答：

甚麼時候對立有可能減少呢？在香港的情況，保守板塊不可能徹底消滅改革板塊，故對立不可能因改革板塊消失而沒有了。即使保守板塊在未來一段時間能把改革板塊擴展的速度減慢，但改革板塊只要能大體維持團結，必會在未來的日子跨越一個臨界點，變成主導社會的力量。一旦越過了那臨界點，保守板塊就會分崩瓦解。（戴耀廷，2015）

撇開「徹底消滅」、「對立」與「分崩瓦解」這些充滿對抗與你死我亡等具撕裂意識的表述不論，若他預期的「改革板塊」日後真的能成為「主導社會的力量」，在其他社會與政治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成了主導力量的「改革板塊」能令社會撕裂減少的想法，顯然一廂情願。當前主導社會的「保守板塊」不能「徹底消滅」「改革板塊」，到「改革板塊」主導後，便能「徹底消滅」「保守板塊」了嗎？若同樣不能，那麼社會撕裂怎能減少？

更重要的現實問題是，若戴耀廷口中的「改革板塊」主導了社會，他們既對「保守板塊」缺乏政治信任，對中國人身份難以認同，對兩地關係的效應評價負面，更要求與內地保持距

離，其背後所流露的，是對中央政府的不信任，那麼，香港的發展前景又會如何呢？對此，戴耀廷（2020）也說「看不到其他出路」，呼籲港人「來一次真攞炒」（意即玉石俱焚），借助西方國家的力量，「攞着中共一起跳出懸崖」。

Rae及Taylor（1970）提到，因為社會出現裂隙，所以便有政治。換言之，社會出現裂隙乃自然之事。在推動民主、落實具競爭性選舉的過程中，由於政治空間擴大、政治動員以爭奪權力的舉動日頻，雖會如Lipset及Rokkan（1967）所指，這會帶來——甚至刺激——社會撕裂，但同樣可促進社會整合，惟所需的背景及條件是競爭權力的各方必須共同信守一些基本原則——即遊戲規則、底線與政治倫理，進行求同存異、相互尊重的君子之爭，而非運用你死我活、非敵即友的鬥爭手段與暴力，相信這才是令社會走向整合的不二法門。

參考書目

- 《中央日報》。2001。〈張榮恭：林報導違背新聞良心 國民黨：扁李借刀非常不道德〉。12月7日。
- 。2003。〈民調·天下雜誌 七成憂失業 僅18%認同扁能力〉。12月15日。
- 《文匯報》。2015。〈譚惠珠：張曉明講話忠於基本法 批反對派編造「特首凌駕三權論」是無理攻擊〉。9月14日，版A03。
- 王卓祺。2015。〈西方民主制度是靈丹妙藥還是興奮劑？〉。載趙永佳、張妙清編，《吐露爭鳴：二零一四時事論叢》，頁132-3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宋恩榮。2017。〈從美國的社會撕裂看香港〉。《星島日報》，9月14日，版A13。
- 《明報》。2004。〈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宣言〉。6月7日。
- 。2015。〈陳祖為拂袖離場 學生：承傳抗爭精神 學生燒基本法 泛民前輩反感〉。6月6日，版A06。